

抗战时期中国接受苏俄文学的特点初探

陈春生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抗战时期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接受苏俄文学资料的疏理,分析了当时中国接受苏俄文学的特点。认为由于战争的共时性特征,中国文学在这一时期通过对苏俄文学的接受,参与到了世界文学中。中国接受苏俄文学的指向性十分明确:直接为抗战服务。由于遵从实用性的审美标准,中苏两国战争文学都将英雄人物神化,忽略了战争本身的悲剧性意义。

关键词 战时中国 接受苏俄文学

从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日本人投降,中国社会处在急剧变革的大转换时期,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之间的联系较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紧密。作为社会生活最直接反映的文学,大部分时间笼罩在战火的硝烟里。因此,这一阶段的文学,它与现实的关系很大部分体现在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上。“五四”文学的启蒙精神让位于民族救亡和民众的政治解放,在整体文化氛围不断变异的情况下,中国文坛对苏俄文学的接受也表现出较为复杂的局面来。由于政治地域的分野,政治意识形态的差异,中国对苏联文学的接受在三个不同的政治区域(以延安为核心的解放区、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和以上海为中心的沦陷区)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如,延安在接受苏联文学时,更注重其激进的革命色彩,而在国统区则努力避免苏联文学的党性特征。尽管如此,由于

有战争这一外在力量的制约,从整体上看,抗战时期,中国对苏联文学的接受依然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和规律。这种接受特点和规律迥异于30年代左翼文学时期对苏俄文学接受。

—

接受苏俄文学新特征的出现与抗战时期的国际大环境有关。在抗战时期,苏联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全面调整了对华政策,尽管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关系亲密,但毕竟国民党是中国的政府代表,苏联必须同它搞好关系。为了避免在远东受日本人威胁,陷于两线作战的窘境,苏联在许诺不支援共产党的前提下,和国民党修好关系,以支持国民党抗战来牵制日本,而且在物质上给予国民党十分慷慨的援助。而蒋介石也愿意有苏联这样在战略利益上一致的盟友,中苏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外在氛围的变化,使一直受围剿的苏联文学不仅能够在解放区流传,而且在国统区也能够与读者见面。茅盾在谈到抗战时期中外文学交流的状况时,对苏联文学的大量涌入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鼓励,他以1941年为界,将抗战时期接受苏联文学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介绍工作主要是苏联战前的作品(苏维埃文学中划时代的长篇小说),以及世界文学名著”。而后期,在介绍接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不用说,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是尤其介绍得多的”。1942年,郭沫若在中苏文学交流会上指出:“近代的苏联文学,无论他们的思想,作品乃至作家的历史及其生活习惯,可以说象洪水一样泛滥到了中国,中国也最关心苏联的文学,以量来讲,

茅盾:《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文哨》1945年5月4日创刊号,第1卷第1期。

恐怕比来自英美的还要多。”这种接受的活跃状况,从当时具体的发展情势中可以得到验证。

先看国统区的接受情况。当时的文化界,为了显示中苏友好,以国民党要员出面组织成立了“中苏文协”,出版了《中苏文化》,以便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改善,当时在大后方,许多报纸杂志,如重庆的《抗战文艺》、《文艺阵地》、《文学月报》、《中原》,桂林的《野草》、《文艺生活》、《文艺杂志》、《文学创作》、《文学译报》,昆明的《文化岗位》等等,都竞相介绍苏联文学,中苏文学的交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鼎盛态势。在重庆,中苏文协不仅定期召开演讲会、学术交流会,还主办了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作家的生平图片展览。而中苏文协所属刊物《中苏文化》对中苏文学交流的推动作用更是不容忽略。这份综合性杂志每期都涉及到文艺方面的内容,而且经常以特辑的形式纪念苏联作家,1937年出版过《普希金逝世百年纪念号》、《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专刊》(1939年又推出了《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1940年至1943年,该刊出版过三个专号:《文艺特刊》、《苏联电影戏剧专号》、《旧俄与苏联作家专号》。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中苏文化》大量介绍卫国战争文学。萧洛霍夫、卡达耶夫、瓦希列夫斯卡娅、西蒙诺夫、苏尔科夫等作家的作品都很迅速地译载到《中苏文化》上,苏尔科夫1941年6月写的《勇士之歌》同年10月就在该刊发表了。从《中苏文化》上的译介接受可以看出大后方对苏联文学的接受特点,这就是,注重文学的系统性,注重翻译与评论并重,注重中苏文学的比较研究,如该刊上发表的《鲁迅与俄国文学》、《中国文学与苏联文学》(翻译论文)、欧阳山的《高尔基与中国文学》和专题资料《高尔基作品中译目录》、《中译苏联戏剧理论及旧作家与

郭沫若:《中苏文化之交流》,《中苏文化》1942年5月30日。

苏联作家之剧本编目》等科研论文及资料,至今都是我们研究中苏文学交流史的宝贵资料。

在根据地延安,苏联文学的介绍表现出十分强劲的势头。以《解放日报》为例,1941年5月创刊至抗战胜利,发表外国文学的译介作品226篇,其中苏俄文学就占193篇,而这其中有152篇是评介苏联文学作品的,这足见延安对苏联文学追踪的紧密,以及将苏联文学直接运用于指导现实斗争的情形。还需要指出的是,延安与重庆接受苏联文学的旨趣不同,延安在译介苏联文学作品的同时,还特别注重文学的革命性色彩,它代表了30年代初左翼革命文学在新时期合乎逻辑的发展。在战时延安,苏联文学不仅成了直接的精神食粮,而且成了革命作家反映根据地生活模仿的蓝本。与此相应在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得到系统和准确的传播,如周扬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萧三译的《列宁论文化与艺术》,曹葆华译的高尔基《论苏联文学》都在这一时期出版发行,这些著作作为延安的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即使在沦陷区,对苏联文学的接受也非常广泛,特别是上海,在传播苏联文学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日本和苏联还保持着外交关系,中共就利用这一条件,以“苏商”的名义创办了时代出版社,出版进步报刊书籍。1942年11月,介绍苏联文学的大型综合性刊物《苏联文艺》创刊,并在全国发行,表面上这份刊物是由苏联人主持,实际上是由中国进步作家和翻译家运作。著名苏俄研究专家叶水夫、姜椿芳、戈宝权、许磊然、草婴等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中坚力量。该刊自1942年创刊,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共出了15期,到1949年7月终刊,总共出了37本。主编罗果夫在这

何茂正、李万春:《抗战时期苏俄文学在中国》,《抗战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

份杂志的创刊号上说：“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俄国文学的声誉在中国特别增长……在俄罗斯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第二次卫国战争时，中国对于苏联文学的兴趣愈加提高了……于是我们出版了《苏联文艺》月刊。我们将在这杂志上发表苏联作家的新作品和旧俄文学的优秀典范。”实际上，为了配合当时抗日斗争的需要，苏联作家的新作品，即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在这份进步刊物上被大量地介绍过来了。这些作品和其他区域接受的苏联文学创作一样，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精神食粮。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国接受苏俄文学的状况。1941年德国人进攻苏联，一直是战争旁观者的苏联成了反法西斯的一支重要力量，“从此以后，过去两大帝国主义营垒互相冲突的帝国主义战争，及苏联采取和平中立政策的局面，转变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局面”。同在反法西斯阵营的中国和苏联，在共同的民族解放任务面前，相互之间的亲和力更为强烈。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作品出现了，这一形势的变化使得中国接受苏联文学的视野开始发生变化，由接受苏联反映国内战争的文学作品转向反映卫国战争的作品。苏联文学作品传播吸收非常迅速，当时苏联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数量，是苏德战争前苏联文学在中国译介的数倍，而全部苏联文学的译介量，比英国、美国、法国文学译介的总量还要多，茅盾当时针对这一情况欣慰地指出：“当自己的民族解放事业尚在艰苦阶段上奋斗的时候，对于表现了自己决定自己命运，创造出人类地上乐园，而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拯救人类命运，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苏联文学，自然不能不发生深厚的兴趣。不，岂但是深厚的兴趣而已，直将由此认识真理，提高勇气。”由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通知》，《新华日报》1941年7月27日。

茅盾：《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文哨》1945年5月4日。

于强调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有关反法西斯战争内容的苏联文学,如短小精悍的诗歌,报告文学及短篇小说,成了最初的接受对象。随着战事的扩大,战线的延长,以及对于战争认识的深化,长篇小说也逐渐开始引进来。这些作品的主要内容是揭露敌寇残暴,歌颂为国浴血奋战的苏联人民。特别是苏联反映卫国战争的小说常常有多个译本在读者中流传,这表明,在激烈斗争的年代,中国人民对苏联战争文学是多么喜爱。

我们不妨举出几部小说来,一窥当时接受的盛况。1943年,瓦希列夫斯卡娅的《虹》被介绍到中国来,在这之前,该小说曾获斯大林文学奖。小说的作者是波兰籍反法西斯流亡作家,波兰被德寇占领以后,她徒步流浪9000里,进入苏联,并参加苏联的卫国战争,《虹》即是以自己亲身经历,反映苏联人民在德寇统治下的英勇斗争。在抗日战争进行到最为艰苦的1943年,接受这部作品,显示了它特殊的现实意义。实际上,当时接受者都是从中国的现实需要出发以同中国现实生活对位的方式来观照这部作品的。苏联文学研究专家磊然认为,这部作品处处透着严酷的真实,作者是以战争的亲身参加者而不是战争的旁观者去描写生活,所以作品洋溢着生命和热情;“虹”预示光明战胜黑暗,人性战胜兽性,民主战

当时,翻译较多的长篇小说有,格罗斯曼的《人民是不朽的》(有三种译本,时代出版社,林陵译;文光出版社,茅盾译;正风出版社,海观译);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民》(有两种译本,时代出版社,水夫译;莫斯科外国文艺书籍出版局出版,继纯译);毕尔文采夫的《试验》(有两种译本,时代出版社,向寒译;莫斯科外国文艺书籍出版局出版,汪浩译);卡达耶夫的《妻》(有两种译本,时代出版社,磊然译;中外出版社,朱葆光译);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有两种译本,时代出版社,磊然译;莫斯科外国文艺书籍出版社,苍木,继纯合译);巴甫连科的《复仇的火焰》(有两种译本,新知出版社,茅盾译;莫斯科外国文艺书籍出版社);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上海苏联文艺连载,水夫译);萧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陈瘦竹译,连载于《时与潮文艺》)。

胜独裁的光辉胜利前景，“从东方向西方延伸着，这条光辉灿烂的带子，把天与地连接起来”。作品所表露的对未来战争胜利的信念无疑给坚持抗战的中国人民以鼓舞，一些评论家直接阐释这部作品所传达的真理对于中国抗战的意义，“《虹》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挺起身子来，才能寻求真理的路径，才能求得人民永远幸福与自由。用偷巧媚笑的方法，是见不到阳光的。”李何林指出：“为了增强抗战精神，为了更深切地认识劳动人民在爱国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力量，为了欣赏和学习她的优秀的创作艺术，《虹》都有被广泛传播和阅读的必要。”

1944年，在法西斯即将溃灭的前夜，格罗斯曼的《人民是不朽的》经郭沫若介绍传入中国。在这部小说中文版的序言里，郭沫若指出，虽然它不是“怎样大部头的巨制，但它把苏联精神和真理必胜的原因充分地形象化了。这是真正的民主主义、人民本位主义的塑像。虽然所处理的只是战役初期，只是极庞大的战争机构的极小部分，但见一枝一叶的真实描绘，我们尽可能推想得出参天大木的全体”。“本书的作者决不是专门高调精神胜利的唯心论者，他了解战争，了解敌人，而且更了解自己。他不怕家丑外扬，他有胆量暴露自己的弱点，因而唤起大家用全力来克服这个弱点。他并不怕增长敌人的志气。这种本领和自由实在值得人们的羡慕和学习”。茅盾在翻译这部作品以后，说这部作品“在描写正面战争中，这是首先出世的杰作”。李广田也从艺术真实的视角评价

《瓦希列夫斯卡和她的虹》，参见黄俊英：《两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从读者中来》，《新华日报》1944年11月27日。

李何林：《读〈虹〉》，《新华日报》1944年1月17日。

郭沫若：《人民是不朽的》序，《新华日报》1944年5月8日。

茅盾：《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文哨》1945年5月4日。

这部小说：“任何虚构的故事都不如正在进行的与敌人搏斗的事实更动人，更重要”，格罗斯曼的小说“写出了这样的事实，一方面是贪婪的法西斯的德国军队，一方面是理性的反法西斯人民，两方面都大量的流血，但是一方面的血是污秽的，另一方面的血却是光辉的……这些人物的创造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作者并不单独的处理某一个人，他把这些人放在一个行动中，而他们实在只是一个人，就如他们和那千千万万的人民为之一个人一样”。从当时人们对苏联文学的接受观点可以看出，人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感受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一是作家直面现实的勇气；一是小说洋溢着的高昂的斗争精神和对正义事业的必胜信念，而这种精神正是中国人民抗击敌寇所需要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战争利益的一致性，相互支持是中苏两国在战时的基本关系，而在文学领域，中苏文学的交流也改变了过去只由中国单向接受的状况，一变而为中苏文学之间的双向交流。这成为中苏文学抗战时期交流的又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抗战前期，在中国同日本人浴血奋战的年代里，处在和平建设中的苏联，以极大的热情声援中国，卢沟桥事变以后，苏联《真理报》、《红星报》等 1000 多种报刊发文声援中国，并颂扬中国的抗战精神。许多作家在苏联作协的安排下，去工厂、学校、农庄演讲，号召苏联人民支援中国的抗战。日军攻打上海时，苏联诗人鲁高夫斯基在《上海——1937》一诗中写道：“不许再进一步，不可征服的上海，活着，战斗着，上海使出你的力量来，人格试炼的战争，已经来到了，您们，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另一位苏联诗人江布尔，也在 1937 年写下了充满了深情的诗篇：“中国人更勇敢的自卫呀，更有力的打击那异国的倭子手，在神圣的民族战争中强大起来，全世界的劳

李广田：《人民是不朽的》，《文哨》创刊号，1945年5月4日。

动人民站在您们一边。”在中国人民处在最困难的日子里,苏联作家除了创作有关中国题材的作品外,还大量地引入中国五四以后的进步文学。当时,以6种语言在世界上发行,极具影响的苏联《国际文学》大量翻译中国抗战文学作品,该刊主编为介绍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作品,曾多次致信中国抗战文协,表达渴望了解中国反侵略文学的意愿,“我们想努力具体介绍中国解放战争中所产生的文学,因为苏联读者对于中国的关心是异常敏锐的,我们的困难是我们的译者不能把中国所出版的新文学尽行知悉,因此不能选出最好的诗或短篇小说”。主编希望,中国的文学界的同仁能给予帮助,他肯定说,“凡是关于现代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上的提供,对于我们都有很大的价值”。1940年7月,《国际文学》为声援中国抗战,出版了《中国抗战文艺特辑》,这样中国文学第一次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相互呼应,在交流中吸取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力量。后来苏联克服了许多困难,将中国作家优秀作品翻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发行,1942年中国文学的翻译达到了高潮。收有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老舍的《被占领的城市中》、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

参见黄俊英:《两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179页。

《国际文学》是苏联当时最具有影响的国际文艺月刊,它的前身是30年代初期,世界各国到苏联避难的革命作家主编的一个国际性的文学刊物。1931年,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后,它被确定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更名为《国际文学》。1935年“国际革命作家联盟”停止活动以后,该刊成为苏联作协对外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同年,为了支援中国的革命斗争,增加中文版。《国际文学》是苏联外销量最大的文艺刊物,它报道着世界各地的革命作家的活动,成为世界革命文学交流的枢纽。卢沟桥事变后,该刊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转载中国的抗战文学作品。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以后,《国际文学》更名为《外国文学》,是苏联与中国抗战联系最为紧密的文学杂志。八年抗战期间,中苏两国文艺界,以组织形式发出的信函联系,其中有关《国际文学》的信函便占四分之一。

《国际文学编辑罗戈托夫来信》,《新华日报》1941年1月19日。

茅盾的《林家铺子》、萧红的《莲花河》等许多作品的《中国小说集》在苏联出版了,而且几乎所有的苏联刊物上,都发表了中国的抗战文艺作品;五四时期的优秀作品也被大量介绍,比如,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孔乙己》、《明天》、《风波》等都在苏联流传。这种相互的接受表明中国文学已经开始融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大潮中,成为世界其他民族的精神食粮。当时一位苏联研究家很诚恳地指出:“苏联作家们非常有兴趣和非常爱护地注意伟大中国人民的文艺之辉煌的成长。中国的小说、诗歌、戏剧、新闻事业,都使我们发生兴趣…….我们希望在人类历史上严重与恐怖的日子里,你们,重视文化文明各民族幸福的文艺家,来帮助我们研究东方文艺中与东方作家中所产生的一切吧”。与此同时,苏联作家还向苏联人民介绍战争中的中国作家以笔为武器和敌人作战的情景:“从民族解放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中国文学家的优秀分子便尽了自己最大责任,拿了来福枪在战场的最前线,不打仗的时候则拿起笔在后方,中国作家没有一刻忘记用自己的行动来保卫祖国的领土独立与完整。”

二

中苏作家的相互支持援助,作品的相互交流,改变了过去单向接受的状况,我们由此可以总结出抗战时期中国三个不同政治地域接受苏联文学时共有的带有规律性的特点:

《苏联作家协会国外组副主席亚布莱丁先生致本刊编辑部同人书》,《中苏文化》第13卷第3、4期。

M 伊凡诺夫语,转引自《1939年苏联文坛掠影》(戈宝权著),《文学月报》1940年第1卷第1期。

首先,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共时性特点也由于中国争取现实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在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和世界各进步国家文学一样拥有了反法西斯侵略的主题。在这一共同的主题之下,中国接受苏联文学时,同30年代初左翼文学时期接受苏联文学的视点不同,接受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一种新形态的文学,只为了服务于现实战争的需要,因此接受者不象左翼时期那样,把文学的阶级性特征强调到一个极为突出的地位,在整个接受过程中,文学的民族性特征、文学的阶级性特征被淡化了,而文学的世界性特征被突现了出来。中国文学因与世界反法西斯文学拥有相同的主题而为他民族所关注,并进而参与到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中。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从一开始就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融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大潮中。中国文学从整体上发展着与世界各进步国家文学的多向联系。解放区和国统区尽管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别,在政治追求上目标不一致,但民族战争使得作家在接受外国文学时,视点趋于接近,即主要受反法西斯战争这个主题支配,接受包括苏联文学在内的世界进步文学,并形成双向交流。

其次,这一时期接受苏联文学的指向性十分明确,接受文学是把它作为武器来直接为现实抗战服务的。由于战事的急迫,对于苏联文学思想层面的接受大大超过了对于艺术层面的关注,也就是说苏联文学更多是从思想层面来给予中国文学以直接的影响。当时许多战争小说是作为抗日教材来使用的。曹靖华曾多次在翻译苏联小说的前言或后记中,指出接受苏联文学的现实意义,即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44年,在延安,柯尔丘克的剧本《前线》发表。为此,《解放日报》1944年7月30日专门配发了社论《我们从考纳丘克的剧本《前线》里可以学习什么》。在谈到剧本的现实意义时,社论强调:“《前线》这个剧本,对于我们的很大意义,就在于它帮助我们教育出很多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干部,和提高人民与军队的文化水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抗战救国的胜利。”

直接将苏联文学作品对应于中国的战争现实,把它作为抗战所需要的精神食粮和教科书来对待。1938年,曹靖华在《铁流》再版后记中指出:“在今天,在全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抗战的炮火里,《铁流》再版,无疑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它将成为争取自由解放的教科书,教育着千千万万的中华民众的儿女,去怎样地消灭敌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它将成为不可遏止的铁的激流,流到前方,流到后方,流到被敌人侵占的区域,流到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去培养千千万万的战士,为着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

1942年,曹靖华再次从现实教育的意义上,谈到苏联文学的巨大现实指导意义:“在今天,在炮烟笼罩着的紧张而艰苦的现实里,用那样艰苦的方法,去传播这些作品,这说明广大读者,尤其是战区及敌后的战士们对于富有滋养的精神食粮之需要,迫切到何种程度!枪和书同他们的生命,结成了万不可分离的一体,在万不得已时,随身所带的任何东西,都可以遗弃,只有枪和书是不能放手的,或则把他们带走,或则同自己的生命一同毁灭。”显然,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战争文学题材显示了更直接的现实指导作用。

其三,在感受世界文学的动向时,中国接受者的文学审美心态也 and 世界进步文学保持一致。战争的急切性使得作家改变了写作的习惯,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能快速表达思想意愿的文学体裁和形式,诗歌、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等成了反法西斯文学最初普遍使用的体裁,随着战事的扩大、战线的延长,长篇小说才开始出现,小说的主题才开始深化,作家们不仅揭示敌人的凶残,还开始揭示反侵略战线内部的种种消极现象。这种现实审美心态的形成决定了接受苏联文学作品的基本思路,接受步骤先是和现实联系紧密

《铁流 后记》,生活书店1938年版。

《文艺生活》,1942年第2卷第2期。

的诗歌、短篇小说和戏剧,而后才是长篇小说。由于接受和创作以实用性为审美的主要标准,文学创作中暴露的问题也带有普遍性。战争表达的“政治——功利”模式使中苏战争文学所表现出的问题也基本相似,或者将英雄人物神化,把战场描绘成英雄驰骋的大舞台,人物概念化较严重;或者只注重传奇故事的叙述,而忽略了人物的刻画。50年代人们在评价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创作时,就指出这一缺点。在战争中诞生的中苏文学,缺乏时间积淀和对战争本质的思考,对战争描写表面化,在讴歌正义战争和苏联人民的英勇无畏的同时,没有展示战争本身所包含的悲剧性意义。中国有关战争小说创作在后一个问题上的缺点比较明显,作家将生活迅速直观地反映出来,小说只注重叙述情节,人物变成发展情节的材料或载体,缺乏对于生活的提炼。1938年,茅盾在评价抗战一年来文坛的创作时指出,“过去一年的前半期,文坛上的主要倾向是着眼于一个个的壮烈的场面的描写。大多数作品把抗战中的英勇壮烈的故事作为题材,而且企图从这些故事的本身说明了时代的伟大……这样的企图再加上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构思去体验等等原因,就不自觉地弄成了注重写事而不注重写人的现象”。从政治层面认识战争,表现战争,这在解放区文学中表现得最为充分,使得战争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停留在固定的叙事模式上,战争

萧洛霍夫在谈到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文学时指出:“在战争时期,大多数作家,根本休想创作出经过长期苦思才孕育成的、语言精练风格完美的大作品。那时候的艺术家的语言是以军队和人民为武装的,作家没有时间给自己的作品加上完美的形式。他们只有一个任务:只要他们的语言能打击敌人,只要他们的语言能支持我们的战士,在苏联人民的心里燃起对敌人的怒火和对祖国的热爱,而不让它熄灭。”这些作品“匆促而潦草”,一位中国的研究者也指出,当时的小说“构思大,笔力差”,“人物性格简单化,忽略人物性格的个性化”。参见《关于解冻及其思潮》第310页,《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一书,第313~317页。

茅盾:《八月的感想》,《文艺阵地》1938年8月,第1卷第9期。

的传奇性和浪漫主义精神构成了战争文学的主要色调。而且由于意识形态和苏联接近,作家切入战争的视角,评介战争的立场以及描写战争的方式很多方面出现程式化倾向。在中国革命胜利后,有关战争文学的基本模式更加凝固,而突破这一模式,成了作家随后追求的目标,但真正的突破,只能在新时期得以完成。

(作者陈春生,1963 年生,湖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滔天罪孽——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出版

由苏智良、荣维木和陈丽菲主编,学林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出版,全书共 52 万字。书中选辑了近十年来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数十篇论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对“慰安妇”制度的起源、实施,“慰安妇”的苦难及“慰安妇”问题性质的认识和战后赔偿等方面作了介绍。